

翻译 经纬

● 张泽乾 著

● 武汉大学出版社

(鄂)新登字 09 号

翻译经纬

◎张泽乾 著

*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430072 武昌·珞珈山)

武汉大学印刷厂印刷

*

168 1/32 14.375 印张 366 千字

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i-100j

ISBN 7-307-01622-2/H·63

定价: 9.80 元

目 录

导言 翻译十论	1
---------------	---

上 编 翻 译 史

第一章 人类翻译历程纵览	33
第一节 记载上古文明的史册	34
第二节 传播中古文明的媒介	41
第三节 连接近代文明的纽带	52
第四节 贯通现代文明的桥梁	61
第二章 今昔译论研究评述	69
第一节 古代和近代的西方译论研究	70
第二节 现代国外的译论研究	77
第三节 我国古代的译论研究	88
第四节 我国近、现代的译论研究	93

中 编 翻 译 观

第三章 翻译研究的哲学观	109
第一节 哲学、科学、艺术相统一的翻译观	110
第二节 翻译哲学的辩证唯物观	115
第三节 翻译哲学的社会历史观	123
第四节 翻译哲学的方法论	128

第四章 翻译研究的科学观.....	135
第一节 翻译科学研究的整体观	136
第二节 翻译科学研究的动态观	142
第三节 翻译科学的方法论	150

第五章 翻译研究的艺术观.....	158
第一节 翻译中的艺术认识和实践	159
第二节 翻译艺术的哲学分析	162
第三节 翻译艺术的美学分析	168

下 编 翻 译 论

第六章 翻译的必然与局限.....	191
第一节 翻译的必然	192
第二节 翻译的局限	200

第七章 翻译的层次与等级.....	213
第一节 翻译的层次	214
第二节 翻译的等级	225

第八章 翻译的过程与性质.....	235
第一节 翻译的过程	236
第二节 翻译的性质	249

第九章 翻译的原则与标准.....	258
第一节 翻译的原则	259
第二节 翻译的标准	276

第十章 翻译的技巧与技法.....	288
第一节 翻译的技巧	289

第二节 翻译的技法	301
第十一章 翻译的风采与风格	315
第一节 翻译的风采	316
第二节 翻译的风格	328
第十二章 翻译的欣赏与批评	344
第一节 翻译的欣赏	345
第二节 翻译的批评	352
第十三章 翻译的功能与价值	363
第一节 翻译的功能	364
第二节 翻译的价值	373
结语 翻译百思	381
附录 语言发展规律刍议	
——兼论法语与汉语的变化特征	401
法汉语言结构探微	432
主要参考书目	451
后记	454

导言 翻译十论

一、关于翻译的概念

什么是翻译？古往今来，诸论迭出，众说纷芸，莫衷一是。主张翻译是解释、是转换者有之，认为翻译是移植、是传真者有之，将翻译视为再现或再创造者亦有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苏联学者巴尔胡达罗夫从语言学角度出发，将它定义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①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运用信息论的观点，将其界定为“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②但是，上述定义并不是经典性的定义，因为符号学、心理学、逻辑学、文化学、社会学、文艺学、美学、系统学乃至哲学等，它们对翻译的表述又各有侧重，互不相同，即使是从语言学与信息论的角度出发，人们的看法也不尽一致。如《辞海》称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所运用的就是语言学的观点，而杨松河先生立足信息论，称“所谓翻译，就是把一种语言代码所承载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代码表达出来”^③，与奈达的定义异曲同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由于研究翻译存在着多条渠道、多种途径，翻译本身有着多重定义也就不足为怪了。

用科学的语言阐释翻译尚且如此不同，那么，用艺术的眼光看待翻译更是因人而异。早在一千年前，我国北宋译经家赞宁就

十分形象地指出：“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唯其花有左右不同耳。”^④翻译界有人生动地把翻译比成“瞻前顾后地走钢丝”，也有人将翻译喻为演戏，视译者如同演员。对翻译褒者有之，贬者亦不乏其人；如称翻译是“不忠实的美女”，是“假朋友”，但在谥贬翻译上，言辞最甚者莫过于意大利的一句谚语“Traduttori——traditori”了，我国一位学者将其译为“翻译即叛逆”，是相当传神的。

依据赞宁的说法，“翻”既可以称为“反”，今人同样可以把“译”比作“易”。始于公元前11世纪、为我国《六书》之首的《易经》，以易命名，便有着其丰富的内涵。“易”包括“变易”、“不易”与“简易”三层含义。“变易”者，指事物变化无常；“不易”者，指运动永不停息；“简易”者，指用永恒的运动原则来把握变化无穷的世界。把这种古老的哲理推而广之，赋予新意，用来形容翻译是再适合不过的。翻译是语言形式的转换，语义内容和文体风格的转移，这种转化就是“易”。“翻”与“反”，“译”与“易”不仅谐音，而且近义。相反相成，变易不易，“反易”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思想，体现着翻译的精义要旨。由艺术与美学的角度观之，把翻译视为反易，这种说法并非是文字游戏与无稽之谈。

从科学视角考察也好，从艺术视角观察也好，尽管人们对翻译的看法不一；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翻译本身进行研讨。翻译不但是一种活动，而且也是一种产品。翻译活动是特殊的、复杂的社会活动，它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社会工具。作为社会现象，翻译既是语言现象，又是心理现象，同时还是社会文化现象。作为社会工具，它不但是异语交际的工具，而且是异语思维的工具。作为社会活动，翻译既要传情、达义，是一种科学“生产”和认识活动，还要表感、表美，是一种艺术“生产”和审美活动。而作为言语行为的结果、科学生产与艺术生产的成品，翻译产品也就是用异语形式进行科学和艺术加工的产物。这种产品既是物质产品，又是精神产品和艺术产品，它在具有使用价值的同时，还可

以具有教育和欣赏意义即认知价值和审美价值。

以上就是关于翻译概念的一些最简洁的阐述，了解这些基本概念对于进行翻译研究来说显然是不可或缺的。

二、关于翻译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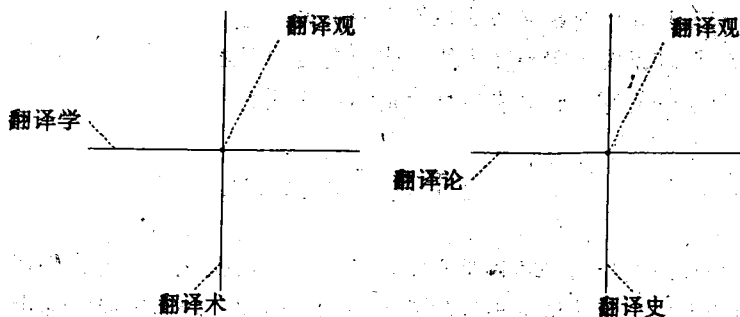
翻译研究作为一项科学研究，顾名思义，就有一个从实践到理论的概括、从感性到理性的升华问题，因此，翻译研究实际上指的就是翻译理论的研究。一般地说，翻译研究包括“学”和“术”以及“史”与“论”两个范畴。

“学”和“术”都是翻译理论的研究对象，它们分属于体系性研究与非体系性研究两种不同的类型。前者具有普遍意义，可以称之为基础翻译理论，即广义翻译学或普通翻译学，而后者则属于一种应用理论，是对翻译经验的归纳和总结，只具有非普遍意义。尽管对翻译的研究包括着“学”和“术”两个方面，但从严格意义上讲，翻译理论研究的核心乃是翻译原理，它是研讨翻译论的基础。

除了翻译论而外，对翻译史的探析同样属于翻译研究的范畴。在对翻译的考察中，“史”和“论”的关系有些类似语言学中“历时”与“共时”的概念。系统、综合的翻译研究应该是史论结合、纵横交织、相辅相成、融为一体的。今天的译论是对传统译论的继承和发展。离开了历史，现实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翻译学与翻译术、翻译史与翻译论的研究的交汇点就是翻译观。翻译观是从事一切翻译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具有自律性与内向性。“学”与“术”、“史”与“论”的研究都离不开正确的思想和原则，规范它们的就是翻译观，它是翻译研究的灵魂。如果我们绘出一份翻译总体研究的“经纬图”，那么，便可将其座标图示如下：

以“术”与“史”为经，以“学”与“论”为纬，以翻译观



作为它们的连接点、交汇点，这就是翻译研究中“学、术、观”与“史、论、观”的辩证统一关系，而对于“史、论、观”的整体考察也就构成了翻译研究的中心环节。

翻译研究是一个大系统，这个系统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不是破碎的而是完整的，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翻译体系是由各个具体的部分或要素组成的，它并非杂乱无章的成分的混合物，乃是一个有着科学的结构和层次的有机体。

结构和层次不是同一个概念，结构是翻译内在的联系形式，层次是其联系的排列次序，二者是互为依存的。

人、物、场即翻译主体、翻译客体和翻译场，不但是翻译活动的三大要素，而且也是翻译研究的基本对象，它们构成了译论研究的整体框架。翻译作为双语活动和双向运动不仅和语言系统有关，而且涉及思维系统、文化系统与其他系统，不但和双语有关，还取决于使用双语的人和使用双语的具体环境，因此，人、物、场三者又是不可分割的。

翻译体系的核心是翻译客体和翻译主体。从翻译客体的角度看，它主要包括语言符号系统、语义概念系统和文体风格系统；从翻译主体的角度说，它主要包括交际活动系统、认知活动系统和审美活动系统，翻译主、客体的这三大系统是互为对应的。从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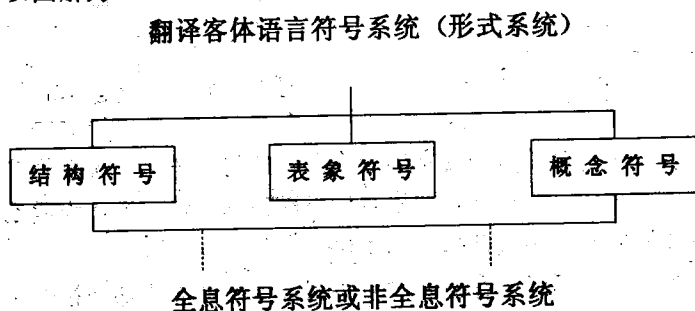
译场的角度看，我们也可以据此将其分为语言场、思维场与审美场，它与翻译主、客体系统之间也分别存在着对应关系。

翻译系统的这三个子系统的关系可以图解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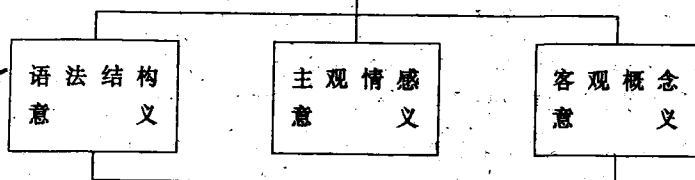
结构是有序的，是通过层次的连接来实现的。在上述三个子系统中，横向联系的三部分，前一部分属于表层结构，后一部分属于深层结构，中间部分为中介层次。

翻译客体与翻译主体同样各有其内部层次。就翻译客体而言，它的语言符号系统作为外部语言的形式系统，可以再分成概念符号、表象符号与结构符号，当这三种语言符号集于一身时，就称作全息符号系统，反之，则称为非全息符号系统。这种层次关系可以图解为：



翻译客体的语义信息系统是作为内部语言的意义系统，它可以分成客观概念意义、主观情感意义与语法结构意义，同语言符号系统一样，当这三种语言符号的意义完全重合时，就称为全息意义系统，否则即称为非全息意义系统。这种层次关系也可以图解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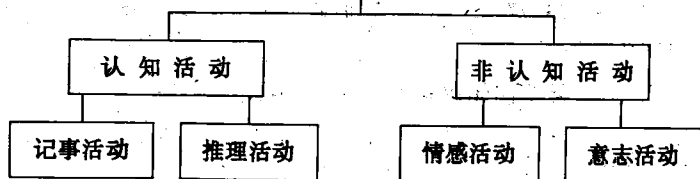
翻译客体语义信息系统（意义系统）



全息意义系统或非全息意义系统

从翻译主体的角度看,其心智活动为认识系统,属于主体内部活动,与作为外部活动的交际活动(实践系统)相对应。它可分成认知活动与非认知活动两个层次,前者包括记事活动与推理活动,后者包括情感活动与意志活动。这种纵向联系的层次关系可图解为:

翻译主体心智活动系统（认识系统）



由上述各个子系统与不同层次所构成的翻译总系统就是这样——一个经纬交织、纵横交错的语言信息转换和传输系统,弄清楚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掌握了翻译研究的钥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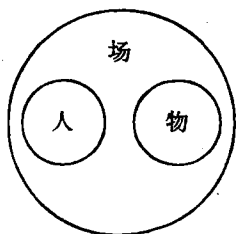
我们说在翻译中存在着对应关系,这是就异语都处在同一层次而言的。翻译时如果异语不处于同一层次,就会出现差异。如法语的 *Les mots sont carrefours de sens* 若译为“字是意义的十字路口”读起来会感到别扭,就是因为只注意了字比句次的概念对应,只是形同;如译成“字是意义的交汇处”就注意了内涵意义的对等,才是神似。又如英语的 *More haste, less speed* 如译作“越快就越慢”在语义层上虽然对应,但却失去了原语的一部分文体色彩,倘译成谚语“欲速则不达”则兼顾了风格层上的对应。翻

译理论对于翻译实践具有不容忽视的指导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三、翻译三要素——人、物、场

与翻译活动和翻译研究直接有关的三个基本要素是人、物、场。三者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所谓人，即翻译主体，既指作者和译者，也指译文读者；所谓物，即翻译客体，包括原文和译文；所谓场，则指翻译场，它与写作场、阅读场有着密切联系。



人、物、场作为翻译活动的三大支柱，不仅是语言学、符号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其他与翻译有关的各学科共同研究的对象。从语言学角度看，语义可以分为语言意义与言语意义。其中语言意义中的词汇意义与语法意义涉及物（即客体），言语意义中的逻辑意义与修辞意义涉及人（即主体），而言语意义中的语境意义则涉及场（即环境）。从哲学的角度看，翻译活动是实践活动与认识活动，人不但是认识主体也是实践主体，物既是认识客体（如原文之于译者）也是实践客体（译文之于译者），场则是主体对客体进行认识与实践活动的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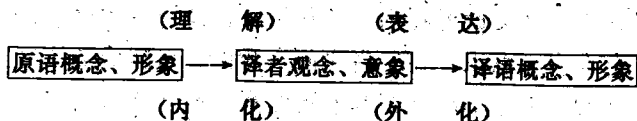
在翻译主体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译者与译文读者。译者与读者都具有双重性，他们既是认识主体又是实践主体。译者与读者的关系实际上是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他们共同体现着一种主体意识。翻译中我们既强调群体意识的影响，更重视个体意识（包括作为个体的每一个译文读者在内）的作用。翻译的主体意识还涉及自觉意识与非自觉意识。在二者之间，我们突出翻译主体自觉意识的能动作用，但亦不能忽视其非自觉意识的创造力量。

正是由于主体精神的存在，译者在不超过物质与精神关系的制约，既忠实于作者又取信于读者的前提下，可以充分发挥再创

造的能动性。在这一方面，前辈翻译家们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严复将 pure reason 译为“清静之地”，把 the state of nature 译作“天造草昧”，傅雷把 Le mois de septembre déploie tous ses trésors 译成“时方九月，秋色斑斓”，都是神来之笔。但是，在发挥主体的能动性时，我们又不能望文生义，陷入“死译”、“硬译”或滑向“乱译”、“滥译”，变得不伦不类，如将法语的 Les petits d'homme（“人的后代”）译成“人孩”或“小人”，把英语的 We are here today and gone tomorrow（“人生朝露”）译为“我们今日这里明日他方”或“我们今日生存明日死亡”即为此例。

在翻译客体中，原文是翻译的认识客体，译文是它的实践客体。翻译的客体也可以说就是本文以及本文所反映的主客观世界。译文作为异语交际赖以实现的手段，之于译文读者的交际效果应与原文读者阅读原文时的感受大致相同或相近。

在研究翻译的主、客体时，应把注意力集中在二者的关系上。在这一方面，它们是对立统一、互动互补的。可以说，客体的观念内容与主体的观念世界之间的矛盾就是理解阶段翻译的主要矛盾。主体与客体既然是作用与反作用、制约与被制约的关系，也就存在着互相转化的可能。翻译中不但客体可以向主体转化，而且主体也可以向客体转化，这种二度转化乃是翻译的本质特征。客体向主体转化是符号性向观念性转化，即由原语的形象、概念化为译者的观念、意象，这就是翻译过程中的理解、抽象或内化；主体向客体转化则是观念性向符号性转化，即再将译者的观念、意象还原为译语的概念或形象，这也就是翻译过程中的表达，再现或外化。翻译主、客体之间的这种转化关系可以图解为：



翻译主、客体之间的上述关系只有在翻译场中才能一目了然。交际主体的主观因素与交际环境的客观因素构成了交际情景的时

空环境即翻译场。简言之，翻译场就是主、客体发生联系的具体时空环境。

翻译中从作者到译者、从原语到译语的替换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从原语语境到译语语境的转换过程。语言环境包括狭义与广义两个范畴。狭义的语境指的是上下文关系即语言场，广义的语境指的是历史、地域背景与社会、文化因素，即文化场。在这一时空场中，翻译场是联系写作场与阅读场的中介，在二者间起着衔接作用。

上述三个时空场并不处在同一个水平面上，因此，反映在它们相互关系中，矛盾的性质与表现形式也就有所不同。就译者与原作的关系而言，在翻译场中存在着传统与现实的矛盾，作者在写作场中反映的现实对于译者来说就构成了传统；就译文与译文读者的关系而言，在阅读场中存在着主观与客观的矛盾，译者在翻译场中渗入的主观因素对于译文读者来说则成了客观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以说，翻译中的基本矛盾乃是传统与现实、主观与客观，也就是主体与客体的矛盾。在传统与现实（作者与译者）、主观与客观（译者与读者）之间存在着两级差异，从而也就增加了译者、特别是译文读者理解原作的难度。翻译中出现的种种困难，归根结底都是由时空差引起的。优秀的文学名著与一些经典学术著作之所以不断被重译，同一读者在不同情况下阅读同一译著时感受不尽相同，其原因概出于此。

四、翻译与语言、符号

翻译学的主要基础学科是语言学和符号学。语言学涉及语音、文字、词汇、语法、文体；符号学涉及语形、语义和语用，它不仅研究作为对象的符号，还研究阐释者与阐释环境。翻译离不开语言、符号，翻译的过程自始至终都是使用语言、符号的过程。

语言和符号是一对孪生的姐妹。今天在学术界存在着一场语

言大于符号还是符号大于语言的有趣争论。持前一种观点者主张语言不但包括符号系统，而且包括价值系统和意义系统；执后一种见解者认为既存在语言符号系统，也存在超语言或非语言系统，人是符号动物，整个世界都是符号世界。笔者认为，争论语言、符号孰先孰后、孰主孰从并无多少实际意义。语言和符号都是社会的产物，又是社会的存在。它们共同传递着人类的交际信息——语义内容，通常人们很难将二者截然分开。然而语言和符号毕竟又是有所区别的。除了话语和文字而外，从标点符号、体语符号、标志符号到各种文化符号都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仅以标点符号为例，它们对于改变言语形式、内容和文体就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唐诗。但是，若将标点符号稍作变动，这首七言律诗也就变成了一首词：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使用符号的魔杖，我们还可以将它化为一幕戏剧小品：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

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可见，翻译时如不注意符号的变化，语言形式、结构、内容、意义、文体、风格上的细微差异就很难表达出来。因此，翻译时不但要注意概念符号所蕴含的客观概念意义与表象符号所体现的主观情感意义，还要重视结构符号所反映的语法结构意义。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是李清照的千古绝唱，其语法结构信息的气息是很强烈的。有人模仿其迭韵形式用大致相同的英语结构将这几句译为：

Seek, seek; search, search;

Cold, cold; bare, bare;

Grief, grief; cruel, cruel grief.

从字面上看似译文无可非议，但其表达形式并不十分符合英语规范，而且改变了主语，也很难说得上完全忠实于原意。可见，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翻译，并不符合“文随其体，语随其人”的翻译准则。

许钧同志在《论翻译的层次》^⑧一文中，把翻译的层次分为思维层次、语义层次与审美层次，并且提出“思维层次是翻译的基础层次，语义层次是翻译的必要层次”，“除思维层次和语义层次的活动外，有着更高层次的要求，这就是文学翻译的最高层次，即审美层次。”^⑨笔者认为这一看法似有值得商榷之处。

关于翻译层次问题，前述已有所提及。探讨翻译的层次必须区分主、客体概念并且研究它们的对应关系。因此，笔者主张，从语言、符号（即翻译客体）的角度来看，宜将翻译的层次分为形式层（语法层）、概念层（语义层）与文体风格层（语用层）这种分类的方法不仅可以和符号学的语形学、语义学、语用学相对应，而且也适用于对我们常说的形式、内容与风格的翻译进行分析，可以更好地用来指导具体的翻译实践。把思维层次与语义层次视为相继性的活动是不够正确的，这是因为思维是主体的认识活动，语义是客体的内在涵义，也是主体的认识对象，它们并不具有衔接性，而只存在对应关系。

语言、符号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既具有精确性又具有模糊性。普遍性与精确性反映着物质世界的客观性与可知性，决定着语言能够翻译，这是翻译的可行性。可译性是翻译理论的一个重要原理。特殊性与模糊性体现着物质世界时空的不可度量性和不可穷尽性，反映着人的精神世界的宽泛性与不确定性，它说明了可译性的局限性。适度性是翻译理论的又一重要原理。可行性与适度性合在一起，也就是翻译的相对性原理。

莎士比亚的不朽悲剧《哈姆莱特》中有句名言：to be or not

to be, 对这句言简意赅的警句我们可以找到多种译文, 如“生存还是毁灭”(朱生豪译); “活下去还是不活”(卞之琳译); “存在还是毁灭”(林同济译); “生存还是不生存”(曹未风译); “是存在还是消亡”(孙大雨译); 还曾有人尝试用古汉语进行翻译, 将其译为“生耶? 死耶?” 这些译例充分说明, 任何语言在总体上都是可译的, 但从接受理论的角度分析, 每个译者的素养不同、感受不一, 因此译文又很难千人一面、完全雷同。

从原则上讲, 翻译可以成为沟通异语交际的桥梁, 但是, 由于每种语言各有其精确与隐晦之处, 翻译中信息的增值与减值现象又是屡见不鲜、不可避免的。Able was I ere I saw Elba 是一句典型的英语回文, 把它的音、形、义都准确无误地翻译出来, 任何其他文字都是无能为力的。要想领会原文的形象美与内涵美, 恐怕还得去欣赏原著才行。但是, 高明的译者总能调动各种手段, 充分发挥译语的优势, 来补偿信息的流失, 将其损失减少至最低限度。许渊冲先生将上述回文译成“不到俄岛我不倒”, “俄”与“我”、“到”、“倒”、“岛”音韵相近, “不到”与“不倒”首尾呼应, 尽管译文无法保持回文形式, 但大体上还是体现了原文特有的气质与风格, 应该说是相当不易的。

翻译不是万能的, 又不是无能的。语言是可译的, 又是难译的。语言、符号的翻译有得有失, 奥秘全在似与不似之间。这是翻译的悖论, 也是翻译的辩证法。一个“似”字确乎可以道出翻译的真谛。

五、翻译与思维、心智

以上我们着重讨论了翻译与客体的关系, 这里我们再来扼要地谈谈翻译与主体的关系。心理学与逻辑学以及其他思维科学是建构翻译学的另一类主要的基础学科。翻译不但是语言活动, 而且是思维活动和心理活动。联系翻译转换过程研究心理机制与思